“真刀真枪干一场”

——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（二）

（上接第1版）

怎样才能高度还原《红楼梦》中那规模宏大、五进四合院格式的古建筑群呢？这又是一个考验。

正定多次邀请全国知名专家、学者就工程施工等进行专题论证。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、中国古建研究所工程师杨乃济、故宫博物院古迹部总工程师王朴子都来到正定，为修建荣国府现场指导、出谋划策。

“严格按照具有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标准修建”——荣国府筹建处工作人员张士文，仍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的叮嘱。磨砖对缝、木刻云盘线……工人们干得一丝不苟。海棠、玉兰、银杏……就连院子里的树木，都严格按照《红楼梦》里描述的树种栽种。

“金门玉户神仙府，桂殿兰宫妃子家”。1986年夏，荣国府落成了。

荣国府是一座仿古建筑，共有房屋212间，游廊102间，由杨乃济主持设计，1984年8月兴建，1986年7月落成。宁荣街在荣国府前面，1986年8月底竣工。中央电视台投入制景费38万元，各方集资370万元。

在电视剧《红楼梦》拍摄过程中，荣国府就火了。1986年国庆节，游客排到了1公里以外，超过1万人次。

开放当年，荣国府吸引130万人次前来参观，门票收入达221万元，旅游总收入1768万元。荣国府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，创下旅游业的“正定模式”。

从此，正定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。

那时，很多游客都是从石家庄市乘坐201路公共汽车到正定游玩。始发站在石家庄火车站，终点站在正定隆兴寺，每15分钟发一趟，十分方便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开通201路还费了一番周折。

201路开通前，从石家庄市到正定县的客车很少，每天只有上午、下午各一趟，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。发展旅游业，就要先解决交通不便这个问题。

习近平和县有关领导商量，想通过石家庄市政府，把市里的公共汽车引到正定。几经协调，1984年4月1日，石家庄市至正定的201路公共汽车开通了。正定人称它是“不花钱的广告”。

游客和居民方便了，但地区交通局的领导却不高兴了——“正定属石家庄地区管，不属石家庄市管。这事超出了行政区划管理范围，是胳膊肘往外拐。”一时间，201路有停运的危险。

为此，习近平出面协调，使这一风波平息，201路公共汽车得以正常运营。

“不论是改革工作，还是经济工作，要说一件，干一件；干一件，成一件。不能说了不做，言而无信。不能有始无终，虎头蛇尾。更不能华而不实，弄虚作假。”很多老同志对习近平这一观点记忆犹新。

看准了就要抓住不放，一抓到底，抓出成效。抓旅游业发展如此，抓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如此。

习近平刚到正定工作，就打赢了一场精神文明建设的硬仗——整治公路晒粮。

1982年，正定全县有220多个生产队在公路上打场晒粮，一度占据京广公路长达12公里。

听说要整治，有人炸了窝：不让在公路上晒粮，就得吃霉麦子！

当时，习近平任县委副书记，分管精神文明建设，牵头负责文明路创建工作。1982年7月，在全县建设文明路动员大会上，他亮出了一组细致的调研数据：

不是说非要在公路上晒粮才能保证征购进度吗？请看统计，没有在路上晒粮的生产队比在公路上晒粮的提前5天完成任务；

不是说留着半边不影响交通吗？请看实测，时速60公里原本一个半小时可跑完京广公路石家庄段，遇上打场晒粮，要跑两个半小时。

有理有据，人们服气。经过整治，当年，北方地区沿袭多年的公路打场晒粮陋习在正定消失了。

抢救古树古寺古城墙

“要热爱自己的家乡，首先要了解家乡。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。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，才能爱之愈切。”

——习近平

正定县委大院里有两棵老槐树，花开花落，几多春秋。人们习惯了闻花香、纳荫凉，却从没想过探究它的年龄。

习近平来正定上任不久，就对老槐树产生兴趣、仔细端详——这树干沟壑纵横、苍劲有力，怕是要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。

“这槐树有多少年了？”他问。

可无人能答。

他提出请林业专家来鉴定。没想到，这槐树竟然是元末明初所植。他又叫人围上铁栏，写明文字，加以保护。习以为常的老槐树，第一次成了“文物”。

当年写的文字，至今仍刻在古槐旁的石头上：“君不见今日之古槐，干若苍松之磐礴，枝若疏梅之虬奇……”

从这两棵古槐开始，习近平让县林业局搞了古树普查。经查，全县共有百年以上古树43株，树龄最长者已有1400余年。县里统一在古树周围做了栏杆和标牌，号召大家爱惜和保护。

正定历史源远流长。自北齐始，它一直是府、郡、州所在地，历经1400多年；辽、金时期，曾两次在此建都。正定悠久的历史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，更有“三山不见”“九水不流”“九楼四塔八大寺，二十四座金牌坊”的美誉。其中，最著名的要属建于隋朝的隆兴寺。

习近平熟知它的历史。1984年，他在《中国青年》上发表文章《知之深 爱之切》，“向青年朋友谈谈我的第二故乡——正定”，对隆兴寺用足了笔墨——

“规模宏大，气势雄伟，它是正定古城的骄傲和象征”；

“著名的铜铸大悲菩萨高达22米，是我国现存最高大、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”；

“隆兴寺中的宝不止这一件。搞书法的人，最看重的是那块隋碑……搞建筑的人，则最推崇摩尼殿……至于搞雕塑的人，则最偏爱摩尼殿中的五彩悬塑观音像”；

……

习近平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，他熟读县志、史料，寻访勘察古迹。

据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张银耀回忆，忙完公务、吃过晚饭，习近平经常拉着他走街串巷，去寻访县志里记载的古寺、古塔、古碑、古城墙……

但是，如同两棵古槐一样，正定文物尽管很多，却并没有得到重视。经历“文革”浩劫，这座古城还没有恢复元气，到处是残垣断壁、碎砖烂瓦，有些古建已是伤痕累累。古城墙周边被坟地包围，上面的砖，经常被人们拆下来盖房子。

隆兴寺这座千年古刹同样损毁严重。在隆兴寺院内，当习近平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“本命长生祝延碑”上沾满泥土、周围杂草丛生时，当即找到主管领导，提出严肃批评：“我们保管不好文物，就是罪人，就会愧对后人。”

在牛家庄村，当习近平看到徐世昌撰文、颂扬王士珍的“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神道碑铭”横躺在大路上，立即找来当地负责人，叮嘱他“要重视历史、重视文物，要收藏保管这些文物”。

文物保护不力、文化系统混乱，古城正定需要找一位能干事的文化系统“掌门人”。习近平斟酌多日，和其他县领导形成一致意见：最合适的人选是贾大山。

正定作家贾大山，曾创作小说《取经》《花市》等，上世纪80年代颇有名气。说起来，他还是习近平到正定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。

交往中，习近平了解到：土生土长的贾大山熟知正定历史文化，对现存的古建及文物情况知之甚多，人称“正定通”。他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，每一座塔，每一尊佛，都了如指掌，对文物保护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。

1982年冬，在县委常委会上，这个提议获得通过。

“可是，我不是党员啊。”

听说要让自己当文化局局长，贾大山难以置信。那个年代，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，而且是部门正职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习近平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组织已经有了安排。”

原来，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：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。第二天上午，非党人士贾大山，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，连升三级，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。

大山上任，局面一新。

习近平在《忆大山》一文中，全面评价了他此后几年的工作：“上任伊始，他就下基层、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，几个月下来，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，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，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常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，隆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临济寺澄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，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”

“春节，是人们阖家团圆的日子。可越到这个时候，父亲越是骑着自行车往外跑。”贾大山的儿子贾永辉回忆说。

原来，正定有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全是砖木结构建筑，最容易着火。每逢密集的鞭炮声响起，贾大山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，就会出去巡察，废寝忘食。

别人劝他，他却说：“祖宗的遗产，国家的宝物，我负责守护。出一点点问题，我就对不起正定，对不起县委，对不起习书记啊！”

1984年4月，习近平向省委汇报，争取到一笔古建修缮专款。利用这笔资金，正定对隆兴寺方丈院、天王殿、戒坛、弥陀殿等进行了修缮和彩绘，还在戒坛南面建起了界碑及牌楼，恢复了隆兴寺历史原貌。

这座几近湮灭在市井深处的千年古刹终于重放异彩，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。

“正定的古建、古物、古文化遗址，每一处、每一件、每一地都划出保护范围，立上了明显的标志，这是习书记让做的。”当时主抓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说，习书记这样做，就是要让全县干部群众人人明白，什么是文物，什么是不可侵占的古建和古文化遗址，为什么要保护文物。

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庄，是1925年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，他指示修缮保护，立碑纪念；

“岸下惨案”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，他请人挖掘整理，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；

组织开展文物普查，健全文物保护制度，组织编写《正定古今》《正定县大事记》并亲自作序……他无不倾注心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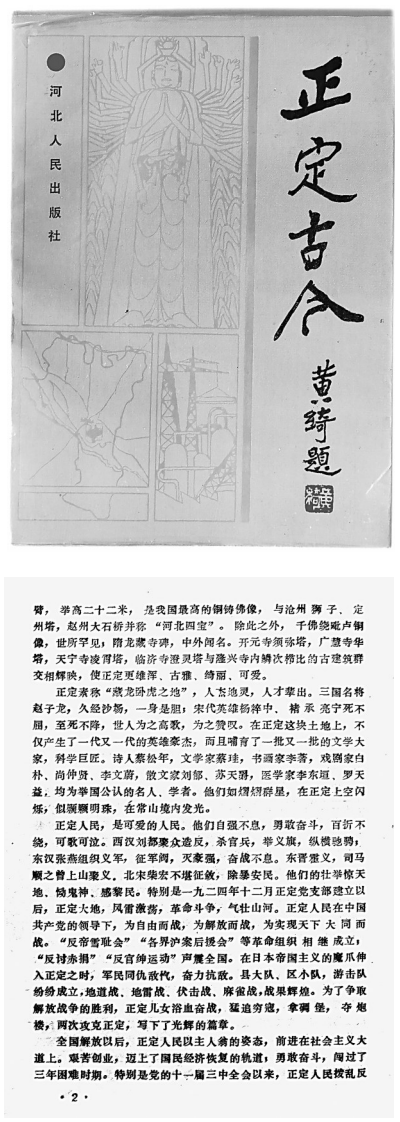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好奇，为什么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这么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？他们从《知之深 爱之切》中找到了答案：

“要热爱自己的家乡，首先要了解家乡。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。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，才能爱之愈切。”

知之甚深，爱之愈切，行之更坚！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县城参加军民共建文明县活动。（资料图片）

1984年6月1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通讯《正定翻身记》，肯定正定的探索，赞扬正定发展“半城郊型”经济“既为城市服务，又掏城市腰包，在服务中发展自己”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，提议并组织编写《正定古今》。1987年5月，他任厦门副市长期间，亲自为《正定古今》作序。（资料图片）